

刘焯 LIU Ye

“世界构造”的历史形式

论《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

The Historical Form of “Worldmaking”

On Architecture in Global Socialism: Eastern Europe, West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old War

书籍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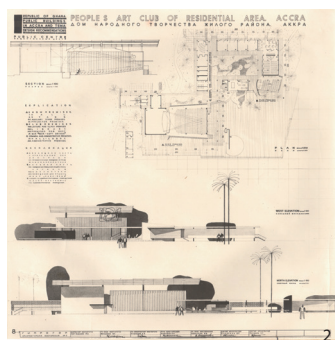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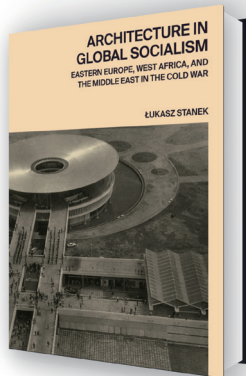
书名: *Architecture in Global Socialism: Eastern Europe, West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old War*

作者: [波] Łukasz Stanek

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 2020 年

ISBN: 9780691168708



1. 加纳《晚间新闻报》对恩克鲁玛视察人民党国家总部的报道，1960年

2. 阿克拉居住区人民艺术俱乐部，前苏联设计

1. News report on Nkrumah visiting new National Headquarter of the 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1960

2. People's Art Club of Residential Area in Accra designed by Giprogor, USSR

摘要 乌卡什·斯坦尼克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中，回顾与分析了冷战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建筑工程援建史，这是研究20世纪这一特有的新生现象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文章分三个部分对这一作品进行了评介和论述：第一部分梳理了书中基本概念形成的历史与政治语境，并呈现它们和更宽泛的二战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对著作的主要章节进行了简述，每个章节通过不同的案例（地域/国别）带出了相应的理论侧重；第三部分立足著作带来的启示基础，探讨了在这一领域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尤其是如何历史化地理解“礼物”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非以规范概念视之。

关键词 批判理论；社会主义；礼物；世界；第三世界；历史化

ABSTRACT *Architecture in Global Socialism* (2020) by Stanek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construction aid of Eastern European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Third World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book is a milestone that examines such a unique new

phenomen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rticle provides comments and a discussion of Stanek's work in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in which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book are developed and build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broader post-war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the second part briefly recapitulates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chapters of the book, each bringing out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focus through a different case (i.e. region/country);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further breakthroughs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book's insights, especially in historicizing the meaning of "gift" and "socialism" rather than viewing them as normative concepts.

KEY WORDS Critical theory; Socialism; Gift; World; The Third World; Historic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256.4; TU-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84X(2022)06-0152-04

1 将理论带回“世界”

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波兰裔学者乌卡什·斯坦尼克（Łukasz Stanek）于2020年出版了新的专著：《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这是一部值得在同样拥有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收获更多读者的作品。从书名可知，作者探讨的是冷战期间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在亚非多地的建筑实践史。在过去的十年中，斯坦尼克一直作为一名代表人物活跃在这个领域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作者先前多篇论文的简单集结，而是在原先作品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加工和整合，所述观点也更加深入。“世界”或“世界构造”（worldmaking）是贯穿这本大书的根本线索，甚至直接体现在每一章的

标题里。如作者写到，之所以命名为“全球社会主义”（global socialism）是为了不把社会主义仅置放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内，而是将后者与第三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一起纳入考察。说起来，“全球社会主义”的说法在近十年的英文学术界渐成气候，尽管这一说法未必在理论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社会主义构想就建立在其内在的普遍性中，因而也就往往体现为世界性的，但它足够反映出两个变化：一是近年来人文社科的全球史转向大潮；二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危机已让社会主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强力复苏。如何构思当下的社会主义或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成了全球思想界的焦点之一。像是不约而同似的，在斯坦尼克这本书面世的同时，连续的

“打捞”社会主义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历史联系的作品可谓雨后春笋——当然，其中大多是论文集的形式，如《另类的全球化：东欧与后殖民世界》(*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1]、《社会主义相遇之指南：冷战期间东德与非洲的分合聚散》(*Navigating Socialist Encounters: Moorings and (Dis)Entanglements between Africa and East Germany during the Cold War*)^[2]、《走向全球的社会主义：去殖时代中的苏联与东欧》(*Socialism Goes Global: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colonisation*)^[3]。相较之下，斯坦尼克的专著显得更为连贯和扎实，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参照系之一。

出身社会主义波兰并不是斯坦尼克关心“全球社会主义”历史的唯一原因，他的知识构成也是他这一视野的基石。在他2011年出版的讲述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理论的专著《列斐伏尔论空间：建筑、城市研究与理论生产》(*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4]就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尤其是战后法国空间理论的熟练掌握。对“全球”的思考而言，他受到列斐伏尔“世界化”(mondialization)概念的启发，并将它视为与冷战末期兴起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的潜在替代项。“世界化”的说法暗示，作为英文概念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与商品流通为动力的全球化，其诡异地包罗了地球(全球)却又逃避了“世界”，它无法承担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性”(world-historical)的人类的形成^[5]。相较之下，在20世纪50—80年代期间发生在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交流则带有不同的启示。如索亚(Soja)所言，法国空间理论之所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独树一帜，离不开拉丁文明传统中的空间观^[6]。当然，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空间视角也很明显，正如他在“南方问题”中的探索所示^[7]。但索亚只说对了一半，他完全无视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欧洲以外的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以及同期世界革命局势反过来对欧洲产生的影响。那是一个如列斐伏尔所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爆炸”(1980年)^[8]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称的“一千个马克思主义”(1998年)^[9]的时代。亚非拉的革命者都尝试着让马克思学会当地语言，而南腔北调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扩展了仅用德语思考的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普遍潜质。换言之，今天我们所知的“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共同参与的创作，而不是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列斐伏尔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la villa du monde)的概念和后来的“星球的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sm)概念在方法论上，由强调在世界中的城市转变到了本身作为世界构成方式的城市及其现象。他明言，这一思想极大地受惠于60年代中国借用游击战争的比喻而提出的世界城市(西欧与北美)和世界

农村(亚非拉)的划分^[10]。我们应当确信，有力的思想绝不来自于字句的不同排列组合。相反，它总是生成于实践中的思想者“此时此地”需求的回应，因而总是历史的。二战后法国空间理论的发达与其说源于拉丁文明的传统，不如说是一项法国知识人的集体认知事业，即如何置身于东西对抗的冷战结构却依旧保持独立。空间性是以革命为通用语的“短二十世纪”的标志之一。在现代性的“世界-历史”的统摄下，横向的空间关联前所未有地被人所自觉和创造。没有这一切，跨大洲的友谊、礼物或团结等概念根本无从兴起。

本书开篇即指出，“如果不考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线索，就无法理解20世纪在巴格达和全球南方许多其他城市的历史”。说开一些，缺失了社会主义的视角，第三世界将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从20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开始，社会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开创性的交往被去历史化、去理论化，乃至被扫进垃圾堆，偶尔能提起的片段也常被当做大国争霸逻辑下的地缘政治延伸。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往往不加甄别地与“后殖民”世界混用)和西方的历史纠葛则在90年代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中被看作是唯—真实有效的主体关系。与其说这是“去殖”意识和承诺，不如说这最终使“去殖”在帝国内部的抽象话语中愈加不知所踪。在高度排他的“殖民地-宗主国”的二元书写中，似乎第三世界人民从来就是和帝国产生联系，而不具备其他的维度和性格，也无法创造帝国不在场的历史。斯坦尼克的作品则展示了被遮蔽的历史生动性。第三世界的概念与实践在其展开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与社会主义思潮及力量互动，乃至互相塑造的线索。当然，反之亦然。历史的社会主义无法在经典资本主义的镜像对称中寻找，它不能简化为一系列的定义和原则，它必须是现象中的多面体。而脱离了与第三世界共享的接触面，社会主义就只能沦为与纸上建筑一样的抽象形式。对中国读者而言，阅读本书也是一个重新熟悉某些概念的旅程。冷战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类分断和阻隔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先前陌生乃至隔绝的共同体之间，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史无前例的新联系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万隆会议、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等，开创性的世界图景与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动绝非今日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所能提供的。与其说这些概念是一堆历史学关键词，不如说它们就是某种世界视野得以形成的标记。世界的构造少不了这些符号及其关系构成的现象学式的体验与想象。

2 从西非到中东的援建史

尽管本书不是一部编年史，但斯坦尼克大致将不同的主题和时间段对应了起来，其四个主体章节(第二到第五章)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第二章是关于西非的加纳共和国与前苏联、波兰援建者之间的复杂故事。加纳(在殖民地期间名为“黄

金海岸”)是二战后黑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1957年)。故事跨度正好是其国家领导人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当政的十年(1957—1966年)。恩克鲁玛是泛非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不结盟运动中的旗帜人物，也是非洲政治家当中罕见的理论家。他曾表示，为了支持非洲的统一事业，加纳甚至可以考虑放弃主权，而与其他出于同样考虑的新兴国家形成更包容的共同体(这在当时的语境中并非空想)。一方面，加纳热情地希望从前苏联获得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作为这一系列任务主要的加方合作者的加纳国家建筑公司(GNCC)并非被动地接受对方的知识和资源的倾泻。相反，双方和合作是一个在地的，充满推拉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加纳国家建筑公司选择接纳了其他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的专家，而前苏联的设计、工程与规划力量则在另一条平行线上在加纳工作着。这样的对接形式恐怕也是第三世界曾出现过的最丰满的理想类型，因为加纳在做殖民地时遗留的工业基础明显好过其他新生的非洲国家。在非洲，“国界”不过是几个欧洲殖民帝国自上而下的划定的。不得已继承了这些疆界的新兴国家极其缺乏民族认同的历史基础。因此，恩克鲁玛那一代的领导人都希望将国家塑造于对于未来的共同渴望中。波兰人参与的具有强烈纪念性的国际贸易展览馆和前苏联方最终未能完成的大片集体住宅，就是对未来美好的现代生活的承诺(图1、图2)。在这一章节，斯坦尼克清晰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援建并不是一部第三世界受控于大国的历史，也非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后者输入前者的历史。第三世界的行动者有着自己的选择，并非完全是社会主义国家单方面的赠予和规划。

值得笔者补充的是，加纳与中国在当时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从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在加纳已规划了多个援建项目，包括纺织厂和铅笔厂等重要的轻工业项目。其中，纺织厂的设计还是中国尝试从习惯的锯齿屋顶改为双坡屋顶的第一次尝试。遗憾的是，1966年加纳的军事政变终止了恩克鲁玛的理想，他在流亡中度过余生。而新政权迅速驱逐了前苏联和中国的一切代表，中国援助的工厂建到一半便就此搁置了。

第三章在案例挑选上做了调整。社会主义的一方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而第三世界的一方则是对社会主义不甚感兴趣(哪怕是在修辞意义上)的尼日利亚。和西欧的老牌帝国不同，也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前苏联不同，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是近现代东欧的边缘地带。它们要么在欧洲列强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成为地缘政治牺牲品，要么沦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以至于进入20世纪后萌发了将自身看作欧洲内部的他者，乃至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的意识。战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再次唤醒和强化了这一看法。这一程度上也成了匈牙利和波兰与非洲产生共情的特殊条件。在援建项目中，这些东欧国家

将二战后本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克服落后”的观念与非洲去殖运动的目标贯通起来。这无疑是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之间经典的政治话语的横向联动和激进的身份类比，即原本万里之遥的陌生共同体之间不断根据彼此的位置，再发现、再创造，和再解释自身的历史，从而扩大彼此的共鸣。在今天，谁还能想象有欧洲国家会在非洲寻找难民兄弟呢？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和卡拉巴（Calabar），波兰和匈牙利建筑师设计工厂、规划城市，甚至对农村民居进行的现代化改建都体现了落后之间互帮互助的精神（图3、图4）。此外，他们对英国人留在尼日利亚的建筑学课纲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造，将其替换为更符合当地实际的新模式则带有鲜明的“去殖”意义。相较之下，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则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异类”，它长期与前苏联集团保持距离，并似乎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之路，现代主义设计也在前南斯拉夫保持了蓬勃的势头。而尼日利亚则因为出产石油而在当时有着较为宽裕的财政，也让它产生了对世界舞台的渴望。因此，前南斯拉夫国有企业能源工程（Energoprojekt）和尼日利亚政府之间于1974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尼日利亚建筑工程公司”（Nigeria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简称“NECCO”）为尼日利亚留下了“联邦秘书处综合体”（Federal Secretariat Complex）和“国际贸易博览馆”（International Trade Fair）等纪念性建筑（群）遗产（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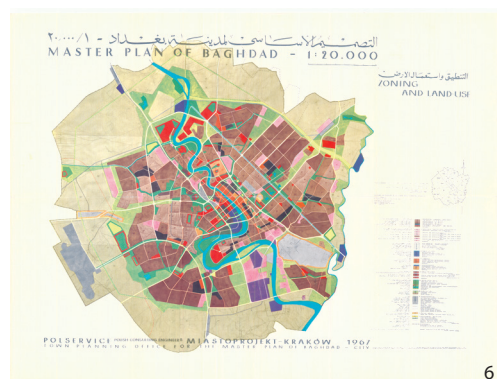
第四章则是将视野带到了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在这里，斯坦尼克从海外援建的切口引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Comecon）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友谊不仅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经济。作者展示了庞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内部是怎样进行系统性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经互会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47年为了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相抗衡而设立。直至其1991年解散，正式成员包括了大部分东欧国家及陆续加入的蒙古、古巴和越南。此外，还有不少亚非拉国家作为观察员列席。比如，伊拉克巴格达的长期规划委托波兰人负责，其专家队伍不仅充斥着建筑师、规划师和工程师，也包括了类似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顾问。他们对伊拉克的规划使得后者换下了英国人最初留下的方案（图6）。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包括石油危机在内的诸多原因严重阻滞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增长，此时，中东受援国的石油成为为东欧国家提供建筑服务的，所需要的，带

有外汇性质的交换物。在具体的项目中，经互会旨在使项目在各参与国之间实现某种分工与配合。这一方面带有强烈的互惠特征，但实际上因为东欧各国需求同质性很高，他们在共同项目上又往往成为竞争关系。另外，经互会在分工中形成了对各成员国的限制乃至控制，使得成员国经济成分单一，最终变为对莫斯科的服从也成了始终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经互会到后期愈加激起成员国不满的重要原因。

第五章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富国科威特和在如今已被视作海湾明星城市的阿布扎比。较之先前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更接近常规的“客户”，而相应的社会主义建筑师也更多表现为是操演着国际市场竞标的新手。在赢得客户的逻辑下，东欧建筑师逐渐熟悉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商务流程，并将这一套行为逐渐内化进社会主义体系中。在具体的设计方案中，东欧建筑师也逐渐开始习惯西方率先开发的computer-aided drafting（CAD）等设计与规范而不断和资本主义的设计生态接近。在斯坦尼克看来，后现代建筑并不只产生于西方建筑史的脉络中（如我们所知的由文丘里等人开创的传统），它还有社会主义一方在日渐含混的空间中的权宜性处理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尽管冷战仍在进行，但地缘政治色彩已明显压倒关于各类“主义”的理想。可见，就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观察到的，一旦脱离革命的动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便日显空洞^[1]。实际上，在1980年代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有非洲国家向东德政府请求援助，后者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回复，要不你问问西德——人家有比我有钱，技术也更好。目前，关于社会主义的后现代建筑也是最近关注的问题。如库力克（Kulic）主编的论文集《第二世界的后现代主义》（*Second World Postmodernism*）所显示^[2]，大部分讨论集中于社会主义内部和社会主义现代性风格自身的演变，而斯坦尼克则通过海外工程这一溢出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边界的现象，展示出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向。实际上，正如笔者论及中国早期建筑援外时所指出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是相互的^[3]，即内与外是相互构造的，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力是借助彼此而显现的。不理解外部，所谓内部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分析的黑箱，就如由混凝土浇筑的几何体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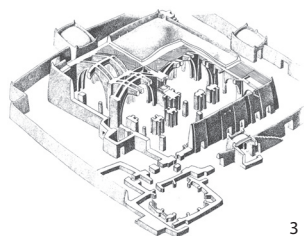
3 援助、礼物与社会主义现代性

斯坦尼克对于建筑援助的解释立足于“礼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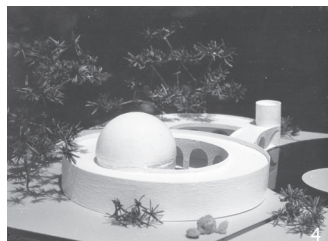


6

3. 尼日利亚扎里某工程的轴测投影图，波兰设计
 4. 尼日利亚卡杜纳地区博物馆的模型，1968年制
 5. 部委综合体（尼日利亚加诺），1973年南斯拉夫能源工程（energoprojekt）设计
 6. 波兰城市工程（miastoprojekt）制定的巴格达总体规划（1967年）
3. Axonometric perspective of a project in Zaria of Nigeria designed by Polish architects
 4. The model of a regional museum in Kaduna of Nigeria, 1968
 5. Ministry Complex in Kano of Nigeria, designed by Energoprojekt, Yugoslavia, 1973
 6. Master Plan of Baghdad designed by Miastoprojekt, Poland, 1967



3



4



5

概念(如“礼物经济”“礼物外交”“礼物建筑”),他意在指出这些援助并不依赖形式平等的市场机制,而是建立在充满道义、伦理和团结的政治基础上,其所追求的就是能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获得实质平等的交换。这当然是有着较大理论潜质的构思,尤其是考虑到它能有效地批评那些常见的刻板印象,如将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援建看作是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行为。但礼物的概念也不应该是单一层次的,社会主义的国际援助无疑包含着礼物经济或道义经济的维度,也即,它有着某种伦理的规范基础。但它不应还原为一种伦理政治。在这里,我们要避免陷入一种伦理和经济的二分,即,将充满“人性”的伦理看成是对无情的经济的一种制衡、中和,或纠偏。这样做会让我们错误地认为伦理和经济成为两个彼此外在的抽象物,尤其让伦理简化为一系列去历史化的抽象教条。实际上,社会主义援助是一个多面体。在资源转移的过程中,它起源于社会主义一方的生产(皆是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它作为礼物的一面是一种交换,而它在受援国的命运则可以成为消费(如住宅),也可以是新一轮的生产(如工厂),这些消费或生产是要帮助第三世界在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脱钩(所谓独立的“民族经济”)。这样一来,它又和国际市场产生了联系(但同时又改造了国际市场)。换言之,在已经历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中,礼物和市场无法截然分离。这些在言辞上看似水火不容的概念之间往往有着一道既分开二者又沟通二者的门,这正是辩证的意义。

另外,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当然,由于语言限制,笔者对东欧的大部分相关知识来自于斯坦尼克的写作和编辑成果),同时代的中国人很少使用“礼物”的说法,这仅仅是修辞偏好吗?恐怕不是。斯坦尼克在书中也提到,礼物不仅是给予,也所暗示着对方还礼的预期(但他没再往下展开)。礼尚往来是人尽皆知的道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最早将礼物理论化,他指出“相互性”是礼物交换的根本性质之一^[14];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走得更远,他认为正是礼物潜在还礼需求使得任何礼物总是会消解自身的意义^[14]。换言之,礼物也可能是居高临下的,别有所求的,或不平等的。那么,共同体(而非个体)之间的礼物怎么交换就大有学问了。礼物一词的缺席应该理解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所理解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特征。相较于东欧多国已实现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同期的中国既拥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又牵连在第三世界的政治语境中。它对援助与不平等之间的微妙关系有着更敏感的意识,1960年苏联单方面全盘中断对华援助便是经典的一课,这使得中国极为强调援助的平等性。实际上,中国紧接着在肩负巨大财政压力而坚持提前还清苏联贷款的行动无疑也是告诉对方,你我从此两清,互不相欠。与此相对的是,周恩来1964年初在其非洲十国之行中宣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的第一条便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

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本文没有空间做进一步解释,但我们应能看到,主动避免将事实上的礼物称为礼物的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理解社会主义礼物逻辑的重要入口。

社会主义援助的意义不能化约为“社会主义”与“援助”两个规范概念的叠加,而是要看到它正是历史地出现和改变的。即,一方面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还原为其在起源于欧洲时以发达资本主义中的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的早期形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援助”乃至“发展”的概念恰恰是在二战后才真正通行的,这些概念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直接相关。正如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1948年)的“普遍”二字所示,“人”的发展在战后成了各种现代化方案(尤其是社资两方)都无法回避的共同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复杂的历史较量中也包含了如何证明己方比对方能更好地定义和实现“现代”的生活。冷战期间,为了不让第三世界倒向共产主义,为了尽量抵消来自社会主义一方的影响,资本主义大国实际上也向第三世界或前殖民地提供了大量援助。作为礼物的建筑工程并不独属于支持“反殖”事业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也能发生在第三世界和曾经的殖民者之间。承认这一点并非是对社会主义礼物的贬低,相反,我们只能在对礼物的内容与交换方式更切近的辨析中,才能更好地逼近社会主义礼物的真正特性所在,才能避开概念先行的循环论证(从定义出发,筛出匹配的现象),也才能真正地指明社会主义的“替代性”到底在哪儿。

任何一种精神的反思都是晚到的,正如建筑的现代主义,其精神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蛰伏在现代化大生产最为典型的美国,但最终要绕道欧洲才获得自觉,成为自为之物。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科学)社会主义,其诞生尽管晚于资本主义,却是第一个就产生自我意识并以人类的口吻将过往一切历史予以对象化的意识形态。与其说它是现代性的另一阶段,不如说它才是现代性迟到的自觉,并以回溯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具体抽象(concrete abstract)的资本主义前史和现代性本身。正是在对概念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否定意识中,社会主义才得以作为反题自我诞生。实际上,我们熟知的包豪斯就站在这一门槛上。在一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诞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包豪斯,反而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冲动。它实则就是资本主义自身所包含的否定性和反省的发展。这一发展是两种可能的合体,体现为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所生发出去的两条路线:一是以汉尼斯·迈耶(Hannes Meyer)为代表的,让这一反省继续自我否定,直至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无法容纳的革命。这就如迈耶和“红色包豪斯纵队”(Red Bauhaus-Brigade)最终离开德绍出走苏联一样;二是以密斯为代表的,将革命重新安排为不超出资本主义限度的新美学,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和解,从而撤销了社会主义为

其做出的死刑判决。社会主义就处于这样矛盾的状态中,从一开始,它就内在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其中,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有无意识到对这些因素的辨识和超越。斯坦尼克著作讨论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场域内,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展示真正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预示着未来的生命力。这里的要点在于,只有当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越出了同质化的逻辑和运行闭环,而暴露在不可控、不可计划、不可化约的历史差异面前时,我们才能更好地观察它的可能性。这应该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建筑文化及其实践逻辑亟需开展的研究计划。斯坦尼克的著作将是这一计划重要的里程碑,人们不仅应该从他阐明的部分出发,还要从他尚未触及的部分出发。

(图片来源:图片均由《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与中东》作者乌卡什·斯坦尼克提供)

参考文献:

- [1] MARK J, KALINOVSKY A M, MARUNG S, et al.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2] BURTON E, DIETRICH A, HARISCH I, et al. *Navigating Socialist Encounters: Moorings and (Dis)Entanglements between Africa and East Germany during the Cold War*[M]. Berlin: De Gruyter Press, 2021.
- [3] MARK J, PAUL B. *Socialism Goes Global: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colonis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 [4] STANEK L. *Henry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 [5]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M]. BRENNER N, ELDEN S, e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 [6] SOJA E.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 New York: Verso, 1989.
- [7] 葛兰西.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M/OL]//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编译. 葛兰西文选(1916—1935),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2022-09-18].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ramsci/mia-chinese-gramsci-192611.htm>.
- [8] LEFEBVRE H. *Marxism Exploded*[J]. *Review*. 1980, 4(1):19-32
- [9] WALLERSTEIN I.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 [1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M]. 郑明萱,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12] KULIC V. *Second World Postmodernisms: Architecture and Society under Late Socialism*[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 [13] 刘焯. 认识新中国早期建筑援外的三条线索 [J]. *新建筑*, 2022(01): 133-138.
- [14] 马塞尔·莫斯.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M]. 汲喆,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6.
- [15] DERRIDA J. *Given Time I. Counterfeit Money*[M]. KAMUF P,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作者单位: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作者简介: 刘焯, 男,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博士候选人

收稿日期: 2022-11-15